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錢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
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钱 穆 著

非外借

中華書局

钱宾四先生
学术文化讲座

錢穆

从中国历史来看 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钱穆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穆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6.9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ISBN 978-7-101-12043-1

I. 从… II. 钱… III. ①民族性-研究-中国②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C955.2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5229 号

©香港中文大学 1979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书 名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著 者 钱 穆

丛 书 名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责任编辑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5 $\frac{3}{8}$ 字数 8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043-1

定 价 35.00 元

图书策划:活字文化 ■

总 序

金耀基

今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校六十周年，新亚书院之出现于海隅香江，实是中国文化一大因缘之事。六十年前，几个流亡的读书人，有感于中国文化风雨飘摇，不绝如缕，遂有承继中华传统、发扬中国文化之大愿，缘此而有新亚书院之诞生。老师宿儒虽颠沛困顿而著述不停，师生相濡以沫，弦歌不辍而文风蔚然，新亚卒成为海内外中国文化之重镇。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下简称“中文大学”或“中大”）成立，新亚与崇基、联合成为中大三成员书院。中文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愿景。新亚为中国文化立命的事业，因而有了一更坚强的制度性基础。1977年，我有缘出任新亚书院院长，总觉新亚未来之发展，途有多趋，但归根结底，总以激扬学术风气、树立文化风格为首要。因此，我与新亚同仁决意推动一些长期性的学术文化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特别有关之“学术讲座”为重要目标。我对新亚的学术讲座

提出了如下的构想：

“新亚学术讲座”拟设为一永久之制度。此讲座由“新亚学术基金”专款设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请中外杰出学人来院作一系列之公开演讲，为期两周至一个月，年复一年，赓续无断，与新亚同寿。“学术讲座”主要之意义有四：在此“讲座”制度下，每年有杰出之学人川流来书院讲学，不但可扩大同学之视野，本院同仁亦得与世界各地学人切磋学问，析理辩难，交流无碍，以发扬学术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讲座之讲者固为学有专精之学人，但讲座之论题则尽量求其契合关乎学术文化、社会、人生根源之大问题，超越专业学科之狭隘界限，深入浅出。此不但可触引广泛之回应，更可丰富新亚通识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讲座采公开演讲方式，对外界开放。我（个人）相信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有一距离，以维护大学追求真理之客观精神，但距离非隔离，学术亦正用以济世。讲座之向外开放，要在增加大学与社会之联系与感通。此其三。讲座之系列演讲，当予以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并尽可能以中英文出版，盖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学人意见之交流也。此其四。

新亚书院第一个成立的学术讲座是“钱宾四先生学术

文化讲座”。此讲座以钱宾四先生命名，其理甚明。钱穆宾四先生为新亚书院创办人，一也。宾四先生为成就卓越之学人，二也。新亚对宾四先生创校之功德及学术之贡献，实有最深之感念也。1978年，讲座成立，我们即邀请讲座以他命名的宾四先生为第一次讲座之讲者。八十三岁之龄的钱先生缘于对新亚之深情，慨然允诺。他还称许新亚之设立学术讲座，是“一伟大之构想”，认为此一讲座“按期有人来赓续此讲座，焉知不蔚成巨观，乃与新亚同跻于日新又新，而有其无量之前途”。翌年，钱先生虽困于黄斑变性症眼疾，不良于行，然仍践诺不改，在夫人胡美琦女士陪同下，自台湾越洋来港，重踏上阔别多年的新亚讲堂。先生开讲的第一日，慕其人乐其道者，蜂拥而至，学生、校友、香港市民千余人，成为一时之文化盛会。在院长任内，我有幸逐年亲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和中国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这几位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有世界声誉的学人的演讲，在新亚，在中大，在香港，都是一次次文化的盛宴。1985年，我卸下院长职责，利用大学给我的长假，到德国海德堡做访问教授，远行之前，职责所在，我还是用了一些笔墨劝动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新亚做八五年度讲座的讲者。这位自嘲为“杂家”、被汉学界奉为“宗匠”的史学家，在新亚先后三次演讲中，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三个关键词作了

渊渊入微的精彩阐释，从我的继任林聪标院长信中知道杨先生的一系列演讲固然圆满成功，而许多活动，更是多姿多姿。联陞先生给我的信中，也表示他与夫人的香港之行十分愉快，还嘱我为他的讲演集写一跋。这可说是我个人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画上了愉快的句点。此后，林聪标院长、梁秉中院长和现任的黄乃正院长，都亲力亲为，年复一年，把这个讲座办得有声有色。自杨联陞教授之后，赓续来新亚的讲座讲者有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许倬云、严耕望、墨子刻、张灏、汤一介、孟旦、方闻、刘述先、王蒙、柳存仁、安乐哲、屈志仁诸位先生。看到这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不禁使人相信，东海、南海、西海、北海，莫不有对中国文化抱持与新亚同一情志者。新亚“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许多讲者，他们一生都在从事发扬中国文化的事业，或者用李约瑟博士的话，他们是向同代人和后代人为中国文化做“布道”的工作。李约瑟博士说：“假若何时我们像律师辩护一样有倾向性地写作，或者何时过于强调中国文化贡献，那就是在刻意找回平衡，以弥补以往极端否定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力图挽回长期以来的不公与误解。”的确，百年来，中国文化屡屡受到不公的对待，甚焉者，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且遭到“极端否定”的命运。正因此，新亚的钱宾四先生，终其生，志力所在，都在为中国文化招魂，为往圣继绝学，而“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之设立，亦正是希望通过讲座讲者之积学专识，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中国文化阐释发挥，以彰显中国文化千门万户之丰貌。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者的演讲，自首讲以来，凡有书稿者，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如有中、英文书稿者，则由中文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如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同出版。三十年来，已陆续出版了不少本讲演集，也累积了许多声誉。日前，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向我表示，讲座的有些书，早已绝版，欲求者已不可得，故出版社有意把“讲座”的一个个单行本，以丛书形式再版问世，如此则搜集方便，影响亦会扩大，并盼我为丛书作一总序。我很赞赏甘社长这个想法，更思及“讲座”与我的一段缘分，遂欣然从命。而我写此序之时，顿觉时光倒流，重回到七八十年代的新亚，我不禁忆起当年接迎“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几位前辈先生，而今狄百瑞教授垂垂老矣，已是西方新儒学的鲁殿灵光。钱宾四、李约瑟、小川环树、朱光潜诸先生则都已离世仙去，但我不能忘记他们的讲堂风采，不能忘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们的讲演集都已成为新亚书院传世的文化财产了。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并迎钱先生 返新亚讲学

金耀基

一

新亚书院的创建是基于几个读书人的一个理想和信念。这个理想和信念就是要承继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二十九年诞生之时，新亚的经济物质条件是极端地贫缺的，但由于这一理想和信念的推动，新亚的创办人钱宾四、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和先驱者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形下，兴发“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

二十九年来，新亚历经多次人事的递嬗、制度的变革，出现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型态。每个阶段的发展型态尽有不同，但对于新亚原初的理想与信念之向往则并无二致。今日，新亚成为中文大学有机的组成，座落在山岩海深、地厚天高的马料水之山巅，从历史的发展看，新亚又进入另一个阶段了。在现阶段的新亚，我们自不能停留在过去，但我们相信新亚是发展的新亚，必也是历史的新亚，我们

从历史中来，也向历史中去。我们珍爱新亚的历史，并且特别企慕新亚创始的文化理想与信念。

二

新亚作为中大成员书院之一，自与她的姊妹书院一样，担负大学共同的教育使命。但亦与她的姊妹书院一样，应继续发展其各别的传统，建立其各别的风格与面貌。新亚今后的发展，途有多趋，但归根结底，总以激扬学术风气、培养文化风格为首要。因此，我们决意推动一些长期性的学术文化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特别有关之“学术讲座”为重要目标。也以此，我们发起“新亚学术基金”之筹募运动。关于此，我曾于去年十一月提出这样的构想：

“新亚学术讲座”拟设为一永久之制度。此讲座由“新亚学术基金”专款设立，每年用其孳息邀请中外杰出学人来院作一系列之公开演讲，为期两周至一个月，年复一年，赓续无断，与新亚同寿。“学术讲座”主要之意义有四：在此“讲座”制度下，每年有杰出之学人川流来书院讲学，不但可扩大同学之视野，本院同仁亦得与世界各地学人切磋学问，析理辨难，交流无碍，以发扬学术之世界精神。此其一。讲

座之讲者固为学有专精之学人，但讲座之论题则力求其契扣关乎学术文化、社会、人生根源之大问题，超越专业学科之狭隘界限，深入浅出。此不但可触引广泛之回应，更可丰富新亚通识教育之内涵。此其二。讲座采公开演讲方式，对外界开放。我（个人）相信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有一距离，以维护大学追求真理之客观精神，但距离非隔离，学术亦正用以济世。讲座之向外开放，要在增加大学与社会之联系与感通。此其三。讲座之系列演讲，当予以整理出版，以广流传，并尽可能以中英文出版，盖所以沟通中西文化，增加中外学人意见之交流也。此其四。

在理想上说，我们当然希望可以设立多个学术讲座，但衡情量力，非一蹴可几，在现阶段，我们决定先以港币四十万元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我们所以首先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其理甚明。宾四先生为新亚创办人，一也；宾四先生为成就卓越之学人，二也。新亚对宾四先生创校之功德及学术之贡献，有最深之感念，所以，我们用钱宾四先生之名以名第一个学术讲座。当我们宣布筹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之计划时，立即受到新亚师生、校友以及大学内外友好的热烈反应与支持。而本院许多校董先生更热心文教，慷慨解囊。迄至此刻，“新亚学术基金”所筹之款虽尚不足成立讲座，但本港商界

两位隐名人士得悉此讲座计划，又知讲座第一位讲者是钱宾四先生本人时，即捐出港币两万元，使讲座得以提前一年开始。这种反应实在是很令人鼓舞的。更高兴的是我们又获得钱先生的首肯，接受我们的邀请，担任讲座的首讲者。钱先生为第一位讲者，无疑使此讲座大为生色，而且更赋予讲座一特别的意义。

三

钱宾四先生不但创建了新亚书院，而且担任了十五年的院长。在新亚开创阶段，艰难万状，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钱先生在《新亚书院概况·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新亚书院之创始，最先并无丝毫经济的凭借，只由几位创始人，各自捐出少数所得，临时租得几间课室，在夜间上课而开始。其先是教师没有薪给，学生无力缴纳学费，学校内部，没有一个事务员和校役，一切全由师生共同义务合作来维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六年时期，依照目前实况，学生照章缴纳学费者，仍只占全校学生总额百分之三十；学校一切职务，仍由师生分别担负。全校仍然没有一个校役。

在他主持新亚这些年头，钱先生说他是曾文正“扎

硬寨，打死仗”这二句话来打熬的。的确，当时的艰苦，书院随时可以遇到绝机，但他常说：“只要新亚能不关门，我必然奋斗下去，待新亚略具基础，那时才有我其他想法之自由。”新亚在钱先生与师生的努力下，克服无数难关，渐渐得到了外界的欣赏与承认。一九五三年，雅礼协会代表卢鼎教授来远东考察，对新亚的理想奋斗，表示敬意与同情，并于次年正式与新亚合作，开始了新亚的新里程。一九五九年起，香港政府也开始直接资助新亚。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的第二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在社会各界的要求下正式成立。新亚与崇基、联合两书院一起参加中大，并成为大学的三个基本成员书院；这是新亚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也是香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时，新亚才有了一个长久垂远的基础。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钱先生内心已决定要辞去院长的职务了。

四

钱先生辞职的理由，有的关涉到“现实俗世界”方面的，但也有是关于“理想真世界”的。他在现实世界完成了创办新亚的事业之后，他就决定回复自我，还归真我的面目，他说：“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世界该同等同视。我们该在此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

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当新亚在困境时，他从未轻言辞职，待新亚有了基础时，他就决定引退了。那时钱先生是七十岁，已逾了退休年龄，但他的精力绝不需退休，他的经济亦不可能退休。可是，他的辞意是坚定的。他根本就没有计划到此后个人的生活。他在一篇有关他辞职的演讲中，讲到一个关于僧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广东的虚云和尚。他说：

我在几年前读虚云和尚年谱，在他已跻七十八高龄之后，他每每到了一处，筭路蓝缕，创新一寺，但到此寺兴建完成，他却翩然离去，另到别一处，筭路蓝缕，又重新来建一寺，但他又翩然离去了。如此一处又一处，经他手，不知兴建了几多寺。我在此一节上，十分欣赏他；至少他具有一种“为而不有”的精神。他到老矍铄，逾百龄而不衰。我常想：人应该不断有新刺激，才会不断有新精力使他不断走上新道路，能再创造新生命。

熟知钱先生与新亚的人，当会同意这则寓意深长的故事最形象化地刻画了钱先生与新亚的关系。他筭路蓝缕，创建新亚，新亚既已办好，他就翩然离去了。这正是他“为而不有”的精神。他离开新亚后，并没有再去创一新亚，但他却完成了跟创一新亚同样有价值的工作。他在

离新亚后几年内完成了五大册的《朱子新学案》。我常觉得钱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总是那么执着，却又是那么灵空。择善而固执是豪杰，“为而不有”的灵空则更是真人了。

五

钱宾四先生已八十四高龄，且困于黄斑变性症眼疾，不良于行，然先生犹肯越洋来新亚作一系列之学术演讲，此可见先生对新亚之深情厚意，至老弥增。而先生之因讲座来，更可见先生对新亚学术文化生命之重视，固无异于其创校初始时也。讲到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钱先生此次之能越洋返校讲学，实大有赖钱夫人胡美琦女士的专心照顾。原来，我们是很想请一位同仁去接迎钱先生的，但钱先生在信中、在长途电话中都坚决表示，由其夫人陪同即足。事实上，这许多年来，钱先生从日常起居到书函著作，无一不靠钱夫人的悉心照应。自与钱先生结褵以来，钱夫人无一日忘记自己学问之研究，今年且完成《中国教育史》一书。同时，更无一刻疏于对钱先生的侍候；钱夫人实在是一位难有的奇女子，这是我们在欢迎钱先生时不能不说的。

最后，我想再讲一件极有意义的事。现在，钱先生不但来新亚讲学了，而且他与夫人还带来了《朱子新学案》

的原稿，送给中大新亚的“钱穆图书馆”展藏。钱先生十四年前于辞职演讲时，曾表示将来他会抱着研究朱子的书稿回新亚来。现在，他果然实现他的许诺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的意义是学术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我们相信一间学府，贵能垂之久远；要垂之久远，则必须以制度为重，庶不致人在事举，人去事息。但一间伟大的学府，则在制度外，还须靠人物赋予风格与精神。而最能传人物之风格与精神者则莫如其书稿。我们能得到钱宾四先生的书稿，则五百年后新亚的后之来者，亦得于摩挲手稿之余，想见创校者一番创校之苦心与理想，而有所奋发，而兴见贤思齐之心，岂不美哉！这是我们在欢迎钱先生时又不能不特别一说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

序 一

一九七七年之夏，金耀基院长自香港来台，访余于士林外双溪素书楼寓庐。是为余两人初次之相识。耀基告余，拟为新亚创办一学术文化讲座，即以余名名之，邀余作首次讲座之讲演。谓此讲座，当每年举办一次，广邀中外学人，集多方意见，庶可资号召，提兴趣，渐成风气，鼓舞研讨。或亦有当于当年新亚建校之宗旨。悦余赞同，彼返港后拟即设法筹募款项作为基金。俟有成绩，再以相告。此事创始虽微，积久或可得巨效。耀基言辞恳切，余漫允之。不数月，耀基来信，筹款已有头绪，决于翌年秋正式举办。乃余于一九七八年初春，忽婴眼疾，逐时加深，不能见字，即报纸上大标题亦模糊不能辨。然念耀基诚挚之意，初亦谓尚有十月之隔，或可临时小愈。耀基亦坚请，告余，临时如不能亲自出席，亦当由余任首讲，邀人代读一论文即可。余终亦无以拒之。卒于是年十月赴港，以一月之期，分作六次讲演。仅就余平日积存胸中之素念，稍